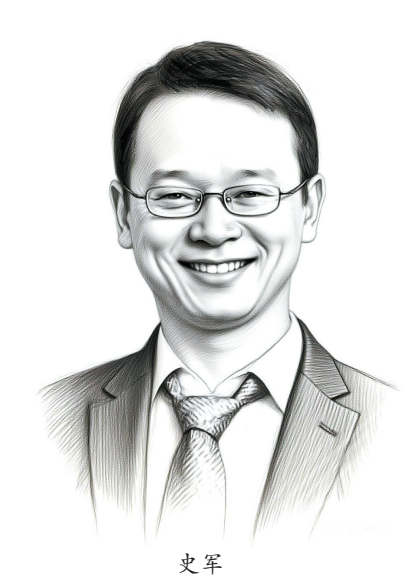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政治内涵



史军

2025年7月,《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出版发行,这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上升到政治高度,在生态文明理论、制度与实践上不断创新,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国际工程展开,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并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生态文明的政治理念

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兴修水利等活动,为改善生态环境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等工作,初步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理论和政策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生态文明政治理念的重要体现,它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绿色发展不仅是一种发展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政治理念的革新,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规划发展时,要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考量因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培育绿色产业和新兴业态,实现经济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同时,绿色发展理念也倡导全社会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生态大局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生态大局观要求我们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生态环境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因此,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不能仅仅局限于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而要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要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形成共建共享的生态环境保护格局。

生态产品与人民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优美的自然景观等优质生态产品,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从政治角度看,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是党和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政府有责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生态与文明兴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文明的兴衰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生态是政治与文明的承载。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文明繁荣的基础,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往往会导致文明的衰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对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生态文明的政治伦理

生态公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公平强调每个人都有平等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同时也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要实现生态公平,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分配资源时,就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利益,确保生态环境的公平分配和保护。通过加强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措施,让全体人民都能公平地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代际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代际正义关注的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公平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享受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要为后代人留下足够的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发展战略和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长期保护。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例如,在能源开发利用方面,要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为后代人创造一个更加宜居的地球环境。

国际政治与生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国际合作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然选择。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与气候治理,倡导携手构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同时,中国也积极履行国际承诺,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生态政治中的责任担当,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

数字化浪潮下 加强对高校学生的精神生活引导

□张璐璐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智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高校学生,数字化生产范式和价值网络已经全面渗透到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和交往等各个领域。当前的大学生是数字原生代,从小生长在数字网络环境中,其精神生活呈现出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基于此,需要深入分析数字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基本特征,为大学生精神生活建构提供有针对性的引导策略。

数字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基本特征

多元化与复杂化伴生。数智技术对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影响深刻而复杂。多元化层面:数智技术极大拓展了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场域,使其从现实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打破了时空限制,让大学生能随时随地获取个性化、智能化的精神资源。例如,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开展信息阅读、课程学习、休闲娱乐等活动。复杂化层面:部分大学生因对数智技术与网络形成高度依赖,滋生了数字成瘾问题,对其精神状态和正常生活造成干扰。

个性化与浅薄化兼有。数字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既表现出自由个性的

充分彰显,亦存在价值理性的明显缺失。个性化层面:数智技术为大学生搭建了丰富的个性化表达空间,使其能依据自身兴趣爱好构建精神生活内容。浅薄化层面:算法推荐催生的“过滤气泡”与“信息茧房”效应,易导致大学生形成现象式思维,在求知学习中难以做到全面系统,进而出现价值理性薄弱、缺乏深刻思考与生命意义追问等问题。

虚拟联结与实体疏离交织。虚拟联结层面:大学生通过注册账号将自身转化为“虚体”,在数字界面中完成娱乐、交往、消费等活动,虚拟联结因此不断强化。实体疏离层面:在数字空间里,真实身体隐藏于屏幕之后,一切互动以数据编码形式展开,精神生活主体呈现“不在场”“去身体化”特点,实体间的现实联结被大幅弱化。

趣缘化与圈层化并存。趣缘化层面:数智技术重构了时空距离,催生了新型社会互动模式,这让大学生能更便捷地找到兴趣爱好与价值取向一致的群体,迅速形成以兴趣为核心纽带的趣缘社群。圈层化层面:数智技术逐渐打破了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的交往边界,数字平台成为主要社交场域。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加速同质性信息聚合、排斥异质性信息,将大学生局限在自身偏好的信息空间内。长此以往,大学生分化成一个个不同的数字圈群,如动漫圈群、电竞圈群、cosplay圈群、模玩手办圈群、汉服圈群等。

数字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引导策略

聚焦主流价值引领,匡正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发展方向。数智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丰富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潜藏着诸多风险。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数字平台建设,引领大学生们的精神成长。一方面,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学生易沉溺于兴趣圈层及圈层文化,与主流价值产生一定隔阂。为此,要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引导他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要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当下,部分大学生的精神追求过度依附物质,精神生活物化导致信仰缺失,难以树立远大理想与坚定信念。为此,要推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 and 制度化,为大学生补足“精神之钙”。

优化数字文化环境,净化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场域空间。在数字空间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易受博眼球的亚文化及不良社会思潮裹挟,亟需通过环境优化筑牢精神防线。一方面,要挖掘和重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具强大生命力与感染力,能为大学生精神生活建构提供优质思想内核与文化滋养。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优质数字文化产业。以数智技术为文化产业赋能,搭建高质量数字文化资源平台,开发多元化数字文化产品,精准匹配并满

生态文明的政治制度保障

推进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生态环境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组建了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组建了生态环境部,整合分散在各相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实施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改革,优化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配置。通过这些改革,有效解决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职责分散、多头管理等问题,提高了生态环境管理的效率和效能。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持续改革,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已初步搭建起四梁八柱的主体框架”。随着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健全,我国以自然资源产权归属的明确,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建立,规范了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秩序,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以环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加强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以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健全,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立,促进了生态保护地区与受益地区之间的利益协调。

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重大改革举措,要加强组织领导,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自实施以来,对各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监督检查。通过督察,发现并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力推动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促进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同时,督察过程中还注重发现问题背后的体制机制障碍,为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了依据。

作者简介:史军,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哲社重点实验室暨南大学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验室研究员

课题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项《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底蕴研究》(GD24ESQ27)

(作者头像绘制 蔡红)

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

凝聚数字育人力量,锻造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引导队伍。引导大学生精神生活需顺应教育数字化趋势,整合并强化数字育人力量。一方面,提升育人队伍的数字素养。专业教师、辅导员等构成的育人队伍,是引导大学生精神生活的核心力量。需着力增强育人队伍的数字意识、数字技能、数字应用实践,从而对大学生进行精准有效引导。另一方面,创新数字育人方式方法。育人队伍要精准把握大学生精神生活的特征,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等,做好个性化、精准化的数字育人策略,避免“漫灌式”引导。

激发主体理性自觉,提升大学生建构精神生活的自主意识。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建构,本质上是微观个体精神不断成长的过程,其核心驱动力源于主体自身。其一,培育大学生数字认知理性。要引导大学生把握事物变化规律、探寻事实真相,主动辨别各种数字资源,自觉筛选健康、积极的内容作为精神生活的养分。其二,培育大学生数字审美理性。要注重培养大学生对动漫、数字游戏等领域的正向审美,助力其建构美好的精神世界。其三,培育大学生数字价值理性。要引导大学生深刻理解数字时代精神生活的发展内涵与意义,自主形塑并坚守符合自身成长需求的价值取向。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讲师)
注:本文为2024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政政治教育课题(2024GXSZ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加强金融支持力度 助力广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欧阳卿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2025年5月20日,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始实施,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具体体现。广东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决策部署,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大金融资源配置力度,优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广东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加大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是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2023年7月发布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要求,“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要求,金融部门要围绕“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等大政方针,持续加大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

加大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是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有效举措。《民营经济促进法》专设第三章“投资融资促进”,内容涉及优化信贷政策、实施差异化监管与激励、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完善融资担保体系等,将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由以往的“政策引导”上升到“法治保障”。这要求,金融部门必须把加强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落实到实践中去,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动能和活力。

加大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是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广东是民营经济大省,2024年,广东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1837.9万户,占全省经营主体总量的96.5%,贡献了全省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进出口额和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就业,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金融部门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的部署,一个着力点就是优化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金融支持广东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近年来,广东通过健全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模式、完善配套服务环境等措施,强化金融与财政、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加强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

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健全。广东省委、省政府于2023年11月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强化资金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等措施。广东相关部门制定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工作部署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广东省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五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从加大民营企业信贷支持、拓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优化民营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引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民营经济的质效、更好满足民营企业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金融产品与服务持续完善。广东金融机构结合民营企业的经营特

点,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力度。例如,针对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方面的融资需求,创新实施“缺口介入机制”“益企共赢计划”“认股权+贷款”等融资模式,为民营科技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又如,针对民营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方面的融资需求,创新推广环境权益资产抵质押融资、碳账户融资等产品。

金融配套服务逐渐优化。一方面,搭建银企高效对接平台。广东金融机构通过推广运用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融资对接平台,强化银企对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民营企业融资的可得性。另一方面,加大民营企业融资的财政支持力度。强化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同,累计出台服务民营企业的融资担保、财政贴息、风险分担等多项配套政策。

金融支持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化举措

下一步,广东要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为契机,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完善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要进一步强化激励约束力度,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民营经济的积极性。一是扩大政策工具运用,用好用足央行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充足的政策资金,以此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强化评估评价,将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 service 情况纳入金融管理部门政策效果评价、金融机构考核评估的范畴,并将评价评估结果作为宏观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督管理的参考指标。

要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在信贷融资方面,要引导金融机构保持对民营企业的信贷供给,落实好无还本续贷政策,加大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首贷、续贷支持力度。在债券融资方面,要支持省内民营企业注册发行科创票据、科创债券、科创混合票据、绿色债券、低碳转型债券等融资工具,充分发挥“第二支箭”的撬动引领作用。在股权融资方面,要建立股权融资辅导名录库,引导设立民营经济专项产业投资基金,抓好国家“科创板八条”“并购六条”等政策的落地,支持省内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要创新面向民营企业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民营经济促进法》要求,“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可持续发展原则开发和提供适合民营经济特点的产品和服务,为资信良好的民营经济组织融资提供便利条件”。为此,要鼓励金融机构针对民营企业的经营特点与融资需求,开发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比如,拓展创新积分贷、政采贷等信用贷产品,推广股权、知识产权等权益类质押融资业务,缓解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抵质押物不足的问题。

要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的配套服务。一方面,要加强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按照《民营经济促进法》“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等要求,依托地方征信平台,融合企业有关司法、纳税、社保、生态、水电气、工商、政府补贴等涉企信用信息,完善民营企业的信用档案,并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向金融机构开放查询,缓解民营企业信用不足、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健全民营企业融资风险分担机制。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构建完善民营经济组织融资风险的市场化分担机制”的要求,鼓励地方各级政府将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贷款纳入政策性风险补偿资金的范围,建立“政府引导基金+银行机构+担保机构”“银行机构+保险公司”等风险分担模式,明确各方责任比例,形成多层次风险分散框架。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